

云冈第9、10窟

的

北魏建筑形象探微

张 华

云冈石窟第9、10窟洞窟的营造,《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》^[1](以下简称《金碑》)所云:“在崇教,小而完,……太和八年建,十三年毕”,根据《金碑》记载推测认为崇教(福)寺即为云冈第9、10窟,为宠阉钳耳庆时(王遇)主持营造的一组双窟^[2]。两窟的宏伟工程开凿于北魏兴盛时期,集中表现了北魏建筑形象的中国化和外来影响,具有造诣巧丽的风格。下面就第9、10窟的北魏建筑形象和它所反映的几个问题分别加以分析与探讨。

一、建筑(窟体)的主要特征和建造情形

此两窟为双窟,位于云冈中部窟群,属佛殿窟。

1. 分前后室:两窟的建筑结构相似,均由前室与后室构成。大小面积相近,平面均为长方形。第9窟前室东西长11.9米,进深4.2米,窟高10.8米;后室东西长11.3米,进深8米(至主尊像佛脚前约3米),窟高10.5米。第10窟前室东西长11.5米,进深4.35米,窟高10.65米;后室东西长10.8米,进深7.2米(至主尊像台座前约3.5米),窟高10.4米。此两窟的前、后室平面大致相同。前室相邻壁开凿有沟通两窟的拱顶小通道,与第7、8窟前室相同。两窟后室主像前平面空间狭窄,北壁下部于佛像背后均建造了一弧形隧道(约高3米,长10米),这种用于对佛右绕的礼拜道,见于云冈大像窟的第5窟,未见于云冈的其他窟,这种做法亦见于克孜尔石窟以及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2窟和窟群区第52窟^[3]。

2. 窟廊与窟檐:两窟外壁均雕凿成建筑形的窟廊(图一),分别有面阔三间的列柱,开间间距大体相同,两窟列柱外侧风化残泐,柱身内侧可见镌刻千

佛,断面呈八角形,柱脚到柱头递减,有明显收分,柱脚下高座为长方形,上雕大象。高耸的列柱和狭窄的开间,就建筑的外貌和构造特征看,表现的是北魏时三间殿的形象。这与大同马铺山太和元年(477年)宋绍祖墓^[4]中雕凿的前廊后室的石椁所见极为相似。该石椁外观呈木构式三开间殿堂建筑形制,前廊面阔三间,进深一间。廊柱四根,高1.03米,平面呈八角形,后室平面呈长方形。1972~1974年对云冈第9窟至13窟窟前进行了发掘,在第9、10窟发现的有向外凸出的表现屋顶出檐的痕迹等^[5],显露出这是一座石雕的殿廊形象,与麦积山石窟第043北魏窟^[6]和天龙山石窟的崖阁建筑基本相似。

两窟外壁崖面上方分列着7个承载木结构的梁孔痕迹,这些建筑痕迹与1972年在第9、10窟前进行发掘发现的7个方柱槽的大小比例、开间尺寸及通面宽,上下对照基本一致^[7]。根据梁孔的排列和窟前的柱础间距情况推测,这是一组典型的依崖构筑的



图一 第9、10窟外景

建筑遗迹。认为北魏时期已在窟前建筑了窟檐是有根据的。且据《金碑》记载,以及1972年和1992年考古发掘^[6]的建筑遗迹和建筑部件,云冈不仅第9、10窟前面以木材建筑窟檐,并在北魏时期窟前曾大规模构筑过与现存第5、6窟木结构窟檐(清顺治八年重建)相类似的建筑。其用途因洞窟内面积较窄,没有僧侣集会说法之余地,因而,功用使然于窟前建造窟檐。印度石窟其洞窟本身即已成堂,因此,中国石窟已非印度原貌。

3. 明窗与拱门:两窟后室的南壁中央上层开明窗,明窗为上角略呈弧状的正方形,顶部中央雕凿一团莲,四周绕以飞天。明窗下部雕饰有精巧的莲瓣装饰分隔带。下层设门,门皆方首,但两窟门道的形制不同,第9窟为拱形门,拱楣上呈弧状雕刻有11尊坐佛龕和周绕飞天,楣端两侧各雕一金翅鸟,其下方各雕一护法像。第10窟为过梁式门,两立颊直承“一”字形楣石,雕饰庄重绚丽,门楣上配置有比例均衡的5枚团莲门簪,莲中饰手牵瓔珞的化生童子;团莲周绕忍冬纹样,其间以镌刻博山炉和动物形象等;立颊雕以忍冬纹样,下方各雕以护法像。两窟前室北壁中部均亦雕凿过梁式门,门楣及立颊雕以忍冬纹样,门楣上雕饰5枚莲花门簪,与宋绍祖墓葬中石椁门楣的形状和雕饰莲花门簪5枚甚为相似。两窟所不同的是门楣之上,第9窟雕凿有装饰精致的仿木构庑殿式屋顶,第10窟雕凿出造型简朴的须弥山。

二、窟内所见个别的建筑形象

云冈石窟第9、10窟内所表现的建筑形象颇多,反映了北魏时代特征。所表现的浮雕塔、窟顶等建筑形象已发表拙文,在此不再赘述。现仅以下几个建筑形象分别述之:

1. 屋形龕:雕刻成殿宇正面模型——屋形龕,用每两柱间的空隙,镌刻较深佛龕而居像^[9]。其摹拟殿宇建筑的龕形,构造简繁不一,见第9、10窟前室东、西壁和后室壁面。屋形龕简单的构造有二种:A、雕凿出仿木构屋顶的瓦垄和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例龕见第9窟后室南壁拱门上部。B、屋顶瓦垄和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垂脊各饰一素面三角形,檐下悬帷幔,例龕见第10窟后室南壁西侧下层。繁复的构造有四种:A、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中央饰四个素面三角形,两垂脊各饰一素面三角形,两龕柱饰忍冬纹,檐下悬帷幔,例龕见第9窟后室西壁第四层。B、两两合一龕,即一屋形龕分别雕凿在两个相邻的

窟壁上,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或脊上饰火焰纹三角形(见第10窟),檐下雕椽头、悬帷幔,例龕见第9窟后室南壁西侧与西壁南侧第二层、第10窟后室南壁东侧与东壁南侧第二层。C、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中央饰一金翅鸟,两侧各有两个火焰纹三角形,垂脊各饰一金翅鸟,屋檐下雕有椽头与一斗三升和人字拱,四个四层层柱式塔或两忍冬纹廊柱将龕分为三间,例龕见第9、10窟前室东、西壁第三层(图二)。D、此式是浮雕殿宇,将壁一面雕刻成佛龕正面,为单间之建筑物,规模较小,建筑细部表现清晰,有阶基、勾栏、椽头、屋顶及雕饰等。其屋顶正脊各置一鸱尾,中央和垂脊各饰一火焰纹三角形,檐下雕椽头、悬帷幔,间内雕一坐佛,台基和台阶周缘雕有勾片栏杆,例龕见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。



图二 第10窟前室东壁

第9、10窟窟壁的浮雕屋形龕,均为庑殿式(四注式)的屋顶,瓦皆筒瓦、板瓦。屋脊上的金翅鸟、三角饰,只是作为建筑装饰纹样,因此这种作为佛龕的外饰,不能完全忠实地表示当时北魏的木构建筑。但这种式样最具特征的表现则为仿木构屋顶,是北魏的主要龕形之一。云冈第12窟、第6窟等以及1987年大同城西小站村北魏建筑遗址发现的仿木构屋形龕^[10],建筑结构清晰繁复,檐柱、额枋、斗拱、台基等颇为可观。因此这些建筑形象和云冈第9、10窟等屋形龕足以提供颇有价值的北魏建筑实证资料。

2. 栏杆:古称阑干。最初的栏杆,全为木构,在建筑结构中无所荷载,起围护作用的部件。云冈石窟浮雕以“L”字纹相互勾搭,构成所谓“勾片栏杆”,简称“勾栏”。此种结构玲珑巧制,镌作在龕前以及建筑物上,见于两窟前室南、北壁上层天宫伎乐龕(图三)、第9窟前室东、西列柱内侧转角处平座及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屋形龕(殿宇)台基、台阶周缘等。



图三 第9窟前室北壁上层

这种栏杆为自南北朝至五代宋初最常用的栏杆纹样，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（984年）和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内的壁藏（1038年）都有此式。

3. 千佛列柱：满雕千佛的列柱后，分别为两窟的前室。窟前室列柱，间距大体相同，柱高约9米（由现埧砖地面算起），外侧现风化残泐，内侧保存完好，两窟当心间柱身均有明显收分，上小下大，而无卷刹；柱脚下作长方形高座，座高于现在埧砖地面约40厘米。座上浮雕大象，亦印度风。试观列柱内侧（图四），大象之上施须弥座，上下涩和束腰，均镌饰忍冬纹样，束腰部分并浮雕有力士承托角部；座之上镌作覆莲，其上山花蕉叶包饰柱身，柱身断面呈八角形，满镌千佛列龕，每龕内雕一小坐佛；柱头饰倒垂莲花，莲花之上施须弥座形大斗，其上镌饰忍冬纹样。

柱身并座之高，约及柱下径之8倍，较汉崖墓中

柱高大。此种列柱云冈第12窟和第9、10窟亦同，异于汉民族传统廊柱，似为外来影响的产物。它的起源似可追溯到印度佛教石窟^[11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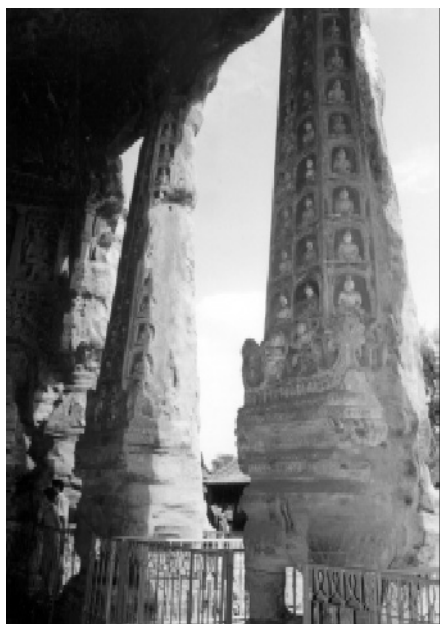
4. 束莲柱：柱身以束莲为饰的柱子，见于云冈第9窟前室东南最东侧列柱上部内转角处（图五）。此圆雕式镌莲柱子，在云冈尚属孤例。刻工精致，巧丽秀美，约高1米。最下是四方形的平座，座极简单，每面上部镌刻仿木构的勾片栏杆纹样，下部镌刻忍冬纹样。座以上是山花蕉叶，山花之上，立柱身，平面做八角形，每面皆素面。柱脚以山花蕉叶包饰四角；柱身中段束以上、下覆莲，上莲是仰覆莲花，覆莲是单层宝装莲瓣，每面两瓣；下莲是倒垂莲花，显然印度风。印度阿育王时代艺术的代表物是鹿野苑之阿育王石柱柱头，石柱自下第一层是钟形的倒垂莲花^[12]。仰覆莲花和倒垂莲花皆作圆形。上、下覆莲束腰部分收分很缓，平面作圆形。柱头施有四方形的须弥座，座分上下涩和束腰，束腰部分收分很猛，每面皆素面。须弥座之上与华绳雕饰部分列柱衔接。

莲花，在建筑物上为印度佛教特有的装饰主题。云冈束莲柱的柱身雕镌莲花，无疑带有印度佛教成分的影响渗入，只是不那么直接明显。因此，第9窟束莲柱犹略存印度的遗韵，似为外来影响的产物。响堂山石窟、嵩岳寺塔亦有此式。

5. 宇（堂）：雕凿成仿石雕殿宇之建筑模型，见于第9窟前室西南最西侧及第10窟前室最东南列柱上部内转角处。这两座建筑物位置高度、体型大小、构造形式等均一致。

台基周缘上雕勾片栏杆，下雕忍冬纹样。屋身三面无开间，檐下雕有檐椽、华拱（二出）。屋顶雕刻瓦垄。这两座殿宇建筑结构亦简单，与第九窟后室南壁东侧浮雕殿宇式屋形龕基本相同，但建筑部分之表现不及浮雕殿宇。

6. 楼阁：浮雕成二层仿木构之建筑，见于第9窟前室西壁第一层南侧以及第10窟前室东壁南侧。第9窟的楼阁部分风化逐层减低减矮，各层均有檐，无平坐。下层出檐，



图四 第9窟前室



图五 第9窟前室

屋顶雕刻瓦垄,檐下悬幔,两立柱左侧立柱和右侧下部残毁,间内雕二佛并坐像。上层立于屋顶之上,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鸱尾,中央饰一素面三角形。第10窟的楼阁风化严重,仅见其轮廓。汉代明器和画像石中楼阁之模型,各层多有斗拱以承载檐和平坐,观其云冈之楼阁乃由汉式多层建筑蜕变而成。

三、关于两窟建筑形象的几点认识

1. 两窟具双窟的意义。所谓“双窟”是指结构与规模大致相同而相邻的两座洞窟。概观第9、10窟洞窟的建造情形、造像内容的配置等几乎完全相同。两窟的建筑结构相似,均由前、后室构成,前室内部空间的设计,直接表现出双窟的布局结构,北、东、西壁规划整齐,莲瓣装饰纹带均将两窟三壁分隔为三层,东、西壁上层屋形龕的配置对称反映出双窟的意义,第9窟东壁与第10窟西壁屋形龕龕柱为忍冬纹样八角柱,第9窟西壁与第10窟东壁同一堵隔壁墙的两面屋形龕龕柱为四层层柱式塔,两窟窟顶的结构相似更明确反映出双窟的意义;后室北壁雕凿主像,从主像台座后侧设置了弧形礼拜道,窟顶南半部雕凿仿木构的平棊藻井(第10窟窟顶风化严重,后世加以彩绘,其结构应与第9窟相同),窟顶的建筑设计与前室窟顶应该是相映照的。

两窟外壁也能领悟双窟的意义,外壁大轮廓比例基本相同的情形,也表明两窟为同时所开的双窟,这种统一的比例关系,说明两窟是一体化的,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建筑的面貌和风格。

《金碑》所记王遇“为国祈福之所建”的窟室,推测亦是双窟,即今第9、10窟,两窟开凿双窟成组建筑形制的布局结构,反映出特殊的历史背景,是“二圣”体制的产物,是当时特定政治形势的产物,也是等级制的表现之一,反映了国家权力的象征。

2. 后室主像前空间狭窄,承袭和融合了早期昙曜五窟大像窟的洞窟形制。云冈昙曜五窟最显著的特征是洞窟形制属于大像窟,平面为马蹄形,窟顶为穹隆顶,这种窟形是三世佛造像占据窟内大部分空间,前边仅留很小的空间供人参拜。第9、10窟后室北壁高台基,高大佛像置其上,东、西两壁雕凿的佛像体躯高大,窟内仅留较小空间,这些特征与昙曜五窟相似。所不同的是气势较昙曜五窟小得多,以及窟顶是平棊藻井,北壁佛像后设置开凿有礼拜道。窟内造像题材和建筑空间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早期洞窟。

3. 两窟既表现了汉民族建筑特征,又融合了外来建筑形象。两窟前室分别雕凿仿木构建筑的三间殿窟廊形式,两窟外一面虽风化侵蚀,但从外观看,整个石窟呈现着汉代木构殿廊的形式;窟内东西两壁的屋形龕,以及窟顶藻井的雕饰,均可看出一定的建筑处理。云冈第9、10窟和马铺山宋绍祖墓石椁的建筑形象,均可藉作对照,这些建筑形式是将汉代木构的营造技术反映在石质上,间接地但却明确地反映了汉代的建筑特征。云冈石窟建筑上的艺术雕刻,在处理手法上还仍然一定程度上融合外来形式,因此,云冈建筑风格、构造手法、营造特点及外来影响等因素的多样化,构成了北魏独特且厚重的建筑文化底蕴,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。

[1] 载自《永乐大典·析津志》抄存的碑文录文。

[2] 宿白《〈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〉校注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·人文科学版》,1956年1月。

[3] 宿白《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——代序》,《中国石窟·克孜尔石窟》(一),文物出版社,(日)株式会社平凡社,1989年12月。

[4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,大同市考古研究所《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1年第7期。

[5] 姜怀英、员海瑞、解廷藩《云冈石窟新发现的几处建筑遗址》,《中国石窟·云冈石窟》(一),文物出版社,(日)株式会社平凡社出版,1991年。

[6] 傅熹年《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》,《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9月。

[7]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、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《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》,《文物》1976年4期。

[8] 李治国《云冈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浅议》,《北朝研究》1994年2~3期。

[9] 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《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》,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第三卷第3、4期,1933年12月。

[10] 曹彦玲《大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魏石造像》,《文物》2002年第5期。

[11] (日)长广敏雄《云冈石窟第9、10窟的特征》,《中国石窟·云冈石窟》(二),文物出版社,1994年10月。

[12] (法)雷奈·格鲁塞著,常任侠、袁音译《印度的文明》,商务印书馆出版,1965年7月。

摄影:张海雁

(作者系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)